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前程

◇ 李庚香

一、进入新时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源泉。2015年12月,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命题,旨在为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问题提供答案轮廓。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在许多场合提出“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要求。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正式提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自19世纪诞生以来,已经经历了三个世纪。每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时代主题都不尽相同。“19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主题是如何认识和理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及批判与替代资本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落后的大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面临着独特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自1848年创立以来,跨越了三个世纪,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经历了从理论到实践、从西欧到苏联再到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程,最有名的概括是三个“七十年”:从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到1917年十月革命,是第一个“七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七十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终结资本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其最大特点是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从十月革命到东欧剧变的1987年,是第二个“七

十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七十年”,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态是列宁主义,其最大特点是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来看的“七十年”,是第三个“七十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相结合的“七十年”,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然而,不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都能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纪形态载入人类思想史册,都能冠名“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称号。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理论研究对象是世界典型样本,二是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三是理论实践成效深刻改变现实世界。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用以上三个条件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可以称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首创成果和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可以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当人类历史敲响21世纪的钟声,马克思主义迎来了新的发展前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主要亮点聚焦在中国大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再次走向高潮的可能,又预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全新形态。新时代,标志着当代

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地理边界而进一步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代表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成就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最精彩的篇章。科学社会主义的巨大能量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世界上两条道路、两个主义、两种制度的较量正在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变化。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特指21世纪中国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之际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来的当代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1840—1949年间,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这是中国被动走向世界的过程。洋务运动表明,没有“道”的变革,“器”是无从发挥关键性作用的。1949—1978年间,中国自主但是局部地融入世界。1978—2008年,中国自主且全方位地融入世界。2008年以来,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受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影响,中国国际方位发生历史性转变,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中国从融入世界交往体系转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指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作为世界社会主义最伟大的实践样本和中心重镇,当代中国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地理边界而进一步具有了

世界历史意义。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以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成为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思想理论高地,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成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理论形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前者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后者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前者是中国向度,后者是世界向度。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使命:改变中国和影响世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双重研究对象:中国实践与人类命运。“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同一个理论体系的两个认识维度,“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问题,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前者是要改变世界,后者是要改变中国。前者的对象是人类命运,后者的对象是中国实践。总之,“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要指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也要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既要推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变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既要为中国的制度成型和制度定型搞好顶层设计,也要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治理制度机制。对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来说,中国人民的福祉和世界人民的福祉是统一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统筹起来,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人类难题,回答了“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怎样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问题。2015年9月,中国向世界提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21世纪全球化发展条件下所形成的一个新的理论形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拓展到关注21世纪人类命运的发展。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国别性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本质上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从关注本国现实转移到关注世界问题、人类问题和人类命运问

题上。这一思想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思路,为迷茫困惑的世界破解了难题,也一定会在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占据重要位置。概括起来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引领问题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思想引领、知识变革和价值重构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攸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与日俱增,特别是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局部政治环境动荡、粮食不足、能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异常以及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等全球性问题,迫切需要拿出可行性解决方案。“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这一系列“世界之问”,十分紧迫地摆在了全人类面前,迫切需要科学理论和正确思想来引领。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十四五”时期和未来15年、未来30年区别于以往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我国在外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把握这一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和发展趋势,是稳妥应对变局、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前提和基础。具体来看,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20世纪的全球经济中心,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重心逐渐向东方转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西强东弱”,又“东升西降”。二是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西方大国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抬头,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美国频繁“毁约”“退群”,进一步加剧了现有的国际治理体系危机。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又加速了国际格局和国际关系的大裂变,经济全球化势头有所减弱。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从机械化到电器化到自动化再到当前的智能化,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使人类社会发生质变。当前,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和宇宙科学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原创性突破,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

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这些都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并由此带动新一轮产业变革,创造出新产业新业态,必将推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进一步塑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从世界边缘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加速发展、加速崛起使中国既是自变量又是因变量。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演变过程,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了加速期,进一步演化、分化、进化、极化。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一百年,在战争与和平、动乱与治理、合作与对抗、开放与封闭的不断反复较量中,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虽然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塑,国际格局加速演变,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但深入人心的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持续给人类带来新的希望和信心,各国相互依存、加强交流合作的动能依然强劲,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因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动荡变革期,也是战略机遇期。能否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

(二)“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人“谋大同”的使命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说“19世纪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20世纪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实际、中国国情相结合,使社会主义理论变为实践,那么,“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则致力于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统筹推进,使之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三条主线。对于中国,是谋幸福、谋复兴问题;对于世界,则是谋大同问题。谋幸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确处理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机遇和风险的关系,把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安全感放在重要位置,正视风险社会的存在,警惕那些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风险。谋大同,则是要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十字路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问题关乎中国和世界的战略安排。因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与为世界人民谋大同有机结合起来。一部世界文明史,就是在不断变化中向前推进的历史。当前蔓延至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绝不仅仅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而是具有超强振幅、超大范围、超快速度的新变量,给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巨大冲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让人们的生产生活生态发生诸多变化,体现出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开放与封闭并存、合作与对抗同在的新特质。面对危机与风险挑战,全人类是携手并进还是相互孤立,成为世界未来走向必须回答的问题。

(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正视“风险社会”问题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新技术革命或第四次科技革命提出的挑战,要从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性冲击中引领世界存在方式的变革。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智能革命。如果从“未来引领今天”的维度来考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奉献给世界的数字化存在方式将可能把人类带入一个仿佛后现代的科幻王国。由于整个世界都将被数字化,人类必须适应智能化时代和智能社会的到来。随着人类走进AI人工智能时代,“风险社会”呈现,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黑天鹅”“灰犀牛”“蝴蝶效应”出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正视本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风险,要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引领人类摆脱生存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却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存在,全球呈现大流行态势。如果公共卫生安全危机得不到有效治理,就有可能诱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治理危机。这次疫情的暴发,也使社会和个人生活发生骤变,出现了很多断崖式的变化。通过这次事件,人们特别是年轻人

普遍增强了危机意识,对未来有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和谋划,迎接各种可能的新变量。城市化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人口聚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趋势,但人口聚集容易出现大规模的疫情传播,对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人们的交往关系和公共生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合作应对挑战,统筹好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我们要像毛泽东同志当年在党的七大所做的那样,全面梳理一下我国在民族复兴最后几十年将会面临哪些困难,特别要警惕那些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风险。要居安思危,在清醒认识困难的基础上确立真正的自信。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因此,“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要敢于斗争,敢于碰硬,又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的艺术,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主导权。而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中国规律”的认识,并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了富有感召力、引领力的洞见,体现出强大领导力。

二、2020年的严峻挑战和有效应对砥砺并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底色与实践伟力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公共卫生危机骤发、风险挑战超常、攻坚克难的一年。我们遇到了罕见的严重冲击:一是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疫情之鉴,映射出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短板,包括疫情失控、经济失速、政策失灵、民主失范、治理失序五大问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为进一步为全球治理增添了难题。在中西应对疫情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的治理体系在应对疫情和随后的经济挑战方面更胜一筹,中国具有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二是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全球

治理体系必然反映新格局。三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打压全面升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在这里,中国既是自变量,也是因变量。中美关系纷繁复杂、跌宕起伏,但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很快达到美国的70%以上,并将持续追赶走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同美国如此接近,更何况我国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国。美国认为,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威胁其霸主地位、巨额利益空间,威胁其价值观。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无所不用其极,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价值理念不同,美国不论谁上台执政,对我国遏制打压的战略意图都不会改变。中美战略博弈既是复兴大国和霸权国家的国家实力之争,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之争,更是单边和多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霸权两种秩序观之争,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竞争都更加尖锐复杂,将贯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然而,大道不孤,天下一家。面向未来,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正生活在一个互通互联、休戚与共的地球村里,绝对没有什么“例外”可言。事实证明,搞意识形态对抗,挖文明冲突陷阱,鼓吹经济脱钩,散布“政治病毒”,都是行不通的。逆水行舟,需要真理领航。真理是存在的顶峰,正义就是在实践中运用真理。在百年变局中,中国要担当引领的潮流。面对“逆全球化”思潮,面对极端主义思潮,面对单边主义强权政治,中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也让利益共享、文明交融、责任共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在这极不平凡的一年里,还有两个方面值得大书特书。

一是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凸显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深厚价值。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不仅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而且冲击

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国家安全、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对全球发展态势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和全世界来说,疫情都是一次危机、一次大考。首先,是对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威胁。其次,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严峻考验。再次,是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量。疫情不分国别、区域、民族,以燎原之势肆虐蔓延,对各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带来严峻挑战。如何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阻止疫情蔓延,如何构建起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织牢织密民众生命健康的防护网,如何有效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来看,“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彰显。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疫情冲击之下,各国都在答同一张考卷,分数高低一目了然。我国抗击疫情和经济恢复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令世界刮目相看。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的集中统一领导,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有效施策,以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最有效的防控举措,同疫情开展坚决斗争,打赢了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和总体战、阻击战。疫情防控和恢复是一个大战场、大课堂,大家从中得到的教育很多、启发思考很多、深刻感悟很多。疫情就像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面镜子,促使人们在阵痛中不断反思和改变。就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来说,我们不仅要和新冠病毒做斗争,不仅要和干部队伍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斗争,还要和国际上对中国污名化的“政治病毒”做斗争,与“中国制度危机论”“中国阴谋论”“中国数据隐瞒论”等做斗争。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感受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尤其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思想引领和价值指引,引领世界走出疫情的“至暗时刻”,为绝望中的人类带来了希望,让黑暗中的世界看到了光明。与此对比,美国总统特朗普搞“美国优先”“美国例外”,把

疫情和经济恢复对立起来,缺乏系统的方法、辩证的方法、统筹的安排,做不到“压茬套种”,搞得手忙脚乱,按起葫芦起了瓢,结果变成了“美国落单”,造成了一个“双输”的结局。同时,我们也深刻体会到了尊重科学的重要性。相较于西方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提倡所谓“群体免疫”,我们始终秉持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努力从科学的角度做出决策、制订方案、组织技术攻关、创新社会治理,努力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表明,无论是以前、现在还是以后,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价值”“中国治理”,深入研究“中国规律”,都将会是中国崛起、中国复兴的强大动力。

二是有效顶住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适应性和坚韧性。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我国率先复工复产,增长由负转正,成为疫情防控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走在世界前列,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反而实现更快跃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不仅增强了国家的基础性实力,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雄辩证明和强大支撑。另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于“十四五”的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谋划,深刻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牢牢占据了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有力有效地指导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实践,并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坚定了全体人民实现美好生活追求的信念,成为国家政治安全、

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依据。

我国能够抵御住险恶国际局势的压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的胜利和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快速恢复,充分展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和治理智慧,深刻揭示了“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密码,砥砺和彰显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底色和强大的实践伟力。总结提炼一年来的经验,关键在于“五个根本”的规律性认识,即党中央权威是危难时刻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的根本依靠,人民至上是做出正确抉择的根本前提,制度优势是形成共克时艰磅礴力量的根本保障,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化危为机的根本方法,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具体分析,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疫情防控取得全面胜利的根本保证

重大风险考验面前、巨大压力之下,哪一种制度更优越、更深入人心,哪一种领导核心更受群众拥护和爱戴,就显得更加清晰和明朗。从“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鲜明对比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制度优势、什么是大国风范、什么是百年大党的责任和担当、什么是人民的领袖和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经过疫情防控这场大考,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中流砥柱的基本盘作用、定盘星的定力作用、指南针的引领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变,党政军民学大动员,东西南北中大会战,举国上下同频共振,亿万人民携手并肩,打响了气壮山河的人民战争和总体战、阻击战。疫情防控的每个紧要关头,习近平总书记一场场统摄全局的重要会议、一次次运筹帷幄的指示批示、一项项审时度势的科学决策,让全党全国人民找到了定盘星、吃下了定心丸。疫情防控的胜利成效再次以铁的事实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发展繁荣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人民的希望所在、幸福所在。

(二)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是中国疫情防控取得胜利的力量之源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坚持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利益、站在人民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立场问题不是虚幻的,而是切实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真正的主人,资本逻辑是社会的主导逻辑,权力受命于资本、受制于资本,也服务于资本,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资本所有者的利益。面对凶猛的疫情,美国坚持选举至上,无视民众生命,闹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导致大量人员感染、死亡;英国抛出“群体免疫”执念,追逐的都是资本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在中国,人民是真正的主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调集全国最优秀的医护人员、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投入疫病救治,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救治患者,不遗漏一个感染者,不放弃每一位病患,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最大限度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人民逻辑高于资本逻辑,人民逻辑也大于资本逻辑,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最好诠释,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占据道义制高点的自然体现,是中华文明人命关天的道德观念的自然流露,也是中国人民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的最好印证。

(三)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是疫情防控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总揽全局、力挽狂澜。面对汹涌疫情,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从中直机关到省、市再到县、乡、村,犹如一台精密机器高效运转,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迅速熔铸成“一块整钢”。中国人民风雨同舟、众志成城,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举全国之力实施规模空前的生

命大救援,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遏阻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经受住了惊涛骇浪般的历史大考。同时,根据疫情形势变化,党中央立足全局、着眼大局,及时做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推动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显示了中国强大的抗压能力、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非凡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在抗疫斗争和经济社会恢复中得到充分彰显和进一步提高。

(四)“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与西方文明价值理念的不同,是“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鲜明反差的文化根源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重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新提升,又注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治国理政是坚持资本逻辑还是人民逻辑,是一种重大价值区别。在“金钱第一”还是“人命关天”之间,在义和利之间,在资本导向还是伦理导向之间,积极应对重大社会风险,构建超越资本逻辑的价值理论体系,不仅有利于摆脱人类生存危机,而且能够巩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人类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历史地位。为什么中国山河无恙?水有源,树有根。中国文化在面对疫情时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凝聚力和团结精神。中西两种文明的差异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西方重“分”,中国重“统”。与西方哲学重视天人二分、重视本体、强调逻辑相比,中国哲学重视天人合一、以天为则、为生民立命,具有崇尚道义、辩证思维、内圣外王等特点。中西所有不同中,最鲜明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统”则力聚,“分”则力散。以“统”为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质,更是一种显著优势。第二,西方重“个体”,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个体权利本位;中国重“共同体”,强调“天下为公”,个体责任优先。前者尽管有助于激发个人活力和创造力,但在重大危机和突发事件面前,往往容易人人自利、人人自危,从而导致麻木不仁、一盘散沙、土崩瓦解、

分崩离析,不仅共同体利益受损,而且个人利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全。而中国注重共同体的意识和实践,在强调个人责任、担当、奉献甚至牺牲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巩固了共同体的根本利益,也最终有利于维护和实现个体的利益。与之相应,西方重平等,中国重平衡;西方重自由,中国重自律;西方重民主,但只是形式民主,中国重民本,是以人民为中心。第三,西方是“经济人”假设,中国是“伦理人”预设。西方是宗教法治型文化,中国是道德伦理型文化。西方的“经济人”假设与中国的“伦理人”预设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导致的是以物为本、资本至上,政治为利益集团服务,尽管也强调政治、行政、司法的公共性、公正性,但在政策制定及其执行层面上容易被资本绑架和扭曲。中国的“伦理人”预设直接产生的是以民为本理念,以“人类”为本,生命至上、健康至上、人民至上,产生了“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孕育了新时代的“公共服务动机”。这种“公心”,这种“良知”,这种“良能”,这种“公共服务动机”,是基于“小康”现实之上的“大同”理想,是基于人性之上的生产方式的要求。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风范,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融入中华文明的精髓和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形成了强调至公至忠、和衷共济、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天下一家的社会价值,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理论公设。在抗疫斗争中,我们不仅全国一盘棋、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而且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全球抗疫贡献了智慧和力量,生动诠释了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五)科技自立自强和创造性应用是化危为机的重要支撑

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应对重大危机的利器、促进发展大局的重

要支撑,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必然要求,也是规律和经验,更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望波澜壮阔、极不平凡的2020年,面对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全球经济衰退和美国遏制打压升级叠加的复杂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进行科学决策,坚定不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重视前沿科技的突破及其在疫情防控、经济恢复、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不仅有效地应对了各种风险挑战,充分证明了我们具备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和实力,而且为迈向“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新征程注入了强大的创新底气和信心。创新要自立,科技要自强。自立自强永远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安身立命最坚实的依靠和屏障。放眼全球、环顾国内,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挑战和困难,我们要想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都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保障和支撑,必须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作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核心技术、高端科技是当今国际竞争的“国之利器”,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我们只有坚决把住关键核心技术这一发展“命门”,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从“1”到“N”的转变,把科技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才能使国家民族的发展基础更为坚实、更为可靠。

三、高扬“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增强国际话语权,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创性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诞生开始就是一种世界性的理论,它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是解决“世界之问”的思想灯塔。每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都需要在各自所面临的时代、民族、社会等具体情境之中努力做出他们的回应。21世纪每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就是全球化,任何国内问题的解决都和解决世界性问题息息相关,反之,任何国际局

势的变化都会深刻地影响国内的发展和稳定,这就是“蝴蝶效应”。作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行动指南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然也是面向世界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关注人类命运,积极面对21世纪的世界性问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并做出了符合理论逻辑、取得显著实践成效、受到国内外广泛认同的中国回应,提出了诸多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完善和实践“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话语权,为破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等严峻问题提供理论指引。

(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增强历史担当、不失历史机遇,在“历史的终结”之后为人类进步新征程指引方向

福山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为背景,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当然,福山撰写《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是带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去思考的,在1989—1992年间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似乎要一统天下的历史背景下,从长远的历史视野出发,福山既充满乐观,又深感忧虑。他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的代序中,把自己思考的问题表露无遗客观地分析,福山提出的如此众多的问题及其分析具有历史的普遍性和厚重性,展示了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天才学者的历史责任感和深远思考,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思想价值。尽管其结论带有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傲慢,以及对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挫折的片面认知和21世纪人类社会制度文明发展趋向的短视,但是福山所提出的“最后的人”的忧虑与无解,恰恰从相反的方面揭示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盛极而衰,连其自身的维护者也无法在这个体系内为21世纪的世界指明走向更好未来的道路。从实践的进程来看,就在福山认为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等要素作为人类思想文明和制度体系的终极特征不久,以美国、欧洲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爆发了金融危机、社会撕裂、政党恶斗、经济恶化、区域冲突等严重问题,曾以美国为主导构建的、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治理体制机制及其世界治理体系遭到美国野蛮的解构,全球化进程出现逆转的趋向,多边主义遭到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遭到严重威胁,资本主义自身一贯所标榜的人权、自由、道义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自身所践踏和抛弃。这也恰恰说明,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可能正是资本主义思想及其制度体系在未来世界主导地位的终结,同时反证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将成为构建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航标和灯塔。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着力于解决民族性、地域性问题,更致力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世界性、普遍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和“历史终结论”相比,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拥有强大的理论威力和实践伟力,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谱写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来最精彩的华章。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的富于道义、智慧和实践有效性的令人信服的解答,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导实践的新形态。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新型治理体系,增进人类福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责无旁贷、当仁不让。自觉自信地高扬“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是理论的自觉和历史的担当,更是历史的机遇。

(二)直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现实问题,为全球经济振兴发挥强大的思想牵引力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是基础,无论实行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一旦经济发展出现问题、陷入困境,其政治上层建筑就会出现动摇甚至崩塌。目前,全世界面临的最普遍、最紧迫、最严峻的问题是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全球增长动能不足,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全球经济治理滞后,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全球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量超过其余99%人口财富的总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也成为许多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根源。面对这些复杂、困难的现实问题,西方业已形成的理论束手无策,西方一些政治家更是为了政治私利将其归结为全球化造成的后果,以民粹主义的操纵操作抵制全球化进程,阻止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便利化。但是,这种缺乏理性和担当的政治操作以及不符合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政策非但未能改善本国的经济和民生状况,而且给全球经济的恢复增加了更大的风险和阻碍因素。面对这种全球经济增长的疲态乃至病态,习近平总书记基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和中国的发展成就、发展经验提出了高屋建瓴、拨云见日的解决思路。早在2017年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瑞士达沃斯国际会议中心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演讲,对解决全球经济难题、走出世界经济发展困境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真知灼见。其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2018年11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做了《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

来》的主旨演讲。他指出:当今世界的变局百年未有,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关乎各国利益,关乎人类前途命运。面对历史大潮,如何才能为世界经济发展把握正确方向?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找到有效治理思路?这里,我愿提出以下主张。第一,坚持开放导向,拓展发展空间。第二,坚持发展导向,增进人民福祉。第三,坚持包容导向,促进交融互鉴。第四,坚持创新导向,开辟增长源泉。第五,坚持规则导向,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对于破解世界经济发展困局的主张反映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规律和全球化进程的正确方向,是其经济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创新点,一经发表就受到了世界性的关注和广泛认同。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企图维护不合理、不公正的既得利益,并以骄横的态度非理性地凸显本国的特殊利益,进行政治操弄,诱导民意,蓄意破坏多边主义,设置贸易和投资壁垒,以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为借口大搞贸易封锁和制裁,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使本来就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但是,这种不符合历史潮流也损害本国长远利益的行为必将自蹈泥淖而不可自拔,最终不得不回到习近平主席所引领的世界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上来。

(三)从理论和战略实施上破解民族国家的利益关切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各种冲突,为构建公平正义的全球治理新秩序、新体系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但是,正如一个和睦的家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一样,当今世界既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又是一个以各自分立的民族国家形态组成的多元复合体。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各国都有共同的认知、共同的需求、共同的道义准则;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历史恩怨因素、发展阶段不同、国际地位的升降、国内政治的压力等,都导致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进程举步维艰、烽烟四起。因此,顺利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

仅要有道义的力量、真理的力量,更加紧迫的是要有切实可行的实践的力量,也就是必须谋划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有效载体,体现高超的战略布局和实施机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蕴含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一系列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了思路,为迷茫困惑的世界找到了前进方向。其主要内容是积极倡导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二,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当前,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我们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要加强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加深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让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互信互敬。第三,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我们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长久和平。第四,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中国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的改革,更好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引导经济全球化更加健康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丰富了国际经济合作理念和多边主义内涵,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发展提

供了重要途径。从中国的积极行动和实际效果上看,2020年11月15日中国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的加入,充分展示了中国加大开放、促进全球经济恢复活力和动力的远见、决心、勇气和胸怀,展示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和积极作为,是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富有成效和感召力的切实行动。此外,经过长达7年的磋商讨论,2020年12月30日中国同欧盟终于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标志着中欧关系从此进入新时代,双方未来将建立更加健康、稳定的长期投资关系,对于中欧人民来说是一件令人欣喜的“新年礼物”。这些重大经贸和投资协定的签署是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被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和地区广泛认同和接受的雄辩证明,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和实践价值的客观体现。

当前,疫情依然在全球肆虐,严重威胁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如何用“21世纪马克思主义”驱散疫情的阴霾,照亮前进路程,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放眼世界,体现了“谋幸福、谋复兴”与“谋大同”的统一,深刻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科学地把握了时代性,引领了世界百年变局的发展方向;比较全面地把握了系统性和整体性,从发展、和平、合作、治理、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富于道义感召和切实可行的行动方略;面对21世纪资本主义的失效、失范、失灵,很好地把握了人民性和普惠性,为回答与解决人类生存风险和共享发展难题、创造人类美好生活提供了新思想新理念,为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解决人类面临的共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并以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不断超越地域性、走向世界化,指明了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形态。

(四)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引统筹解决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问题,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辉煌成就增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话语权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基于全球化和国际背

景而言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凸显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问题和世界化形态。发展和实践“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两个根本性问题,一个是中国化特质的世界性理解问题,另一个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进而促进世界性问题的价值性问题。

对于解决第一个问题来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面对世界性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回答理论的共同价值问题,也就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文化对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应对生存和发展风险的有益性和可借鉴性,并找到中国文化、中国价值观与西方文化、世界多元文化及其价值观的融通逻辑和载体。在这方面,我们既要积极主动地揭示、提炼、传播中国文化元素的价值,又要自觉规避西方曾经自负、蛮横地向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销资本主义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的陷阱,防止意识形态输出和西方颜色革命的覆辙及其污名。“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构建必须确立这样一种认识逻辑,即人类文明的差异性是本质的,文明只有形态和内涵的不同,而没有贵贱优劣之别,都是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和不同历史阶段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人类文明的差异并不必然带来冲突和对抗,而恰恰可以交流互鉴,丰富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内涵,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找到思路和出路。正如,中医可以治病,西医也可以治病,但他们都不可能包治百病,而中西医结合则更加有利于治疗中医或西医都难以治疗的疑难杂症。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增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话语权,必须重视融通中国价值与西方价值、世界多元价值的跨文化问题,消除价值壁垒,斩断价值鄙视链,最大限度地压缩价值观对立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消除西方一些政客操弄价值观对立和文明冲突的现实基础。其中,特别需要阐释中国伦理精神与西方科学精神、中国士大夫风范与西方法治思维、中国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主规则、中国的集体本位与西方的个人本位、中国的天人观与西方的世界观等“中国价值”话题,

求同存异,避免水火不容,力求做到水乳交融,使“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传播和引领作用达到“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纹)的效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化要解决的第二个根本问题,是必须能够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程,通过构筑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高地来巩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所占据的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达到“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的效应。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代替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是世界历史演进的必然过程,也是中国社会近现代以来的内在要求与必然趋势。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被奉为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辉煌成就证明,现代化是趋势,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是唯一的,中国的现代化路径是一种创造,也是对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探索和贡献。如何引领全球化,如何进一步实现现代化,是重大时代课题。现代化是由西方率先发起的,现代性是由西方首先书写的。西方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遭遇了“现代性之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历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迥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鸦片战争后,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探索,先后完成了对现代化器物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过程。在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是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统一,是具有感召力和引领力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相比,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但是,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高歌猛进之时,也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和打压,直接表现为意识形态攻击、军事安全威胁、贸易壁垒和高科技封锁等,从而不得不面对世界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但中国好,世界才能更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只有解决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稳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才能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和更加坚定的信心以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协调、统筹推进,但从优先性和根本性上来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成效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实际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就体现了这一根本性认识,其中最为鲜明的标志就是提出构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塑造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遵循发展规律、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必然选择。当前,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变化,需要辩证认识机遇和挑战的关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谱写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新篇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与时俱进提升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大国经济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国内循环居于主体地位。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供给和需求对于经济循环起到主要的支撑作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美国和发达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趋向,传统的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甚至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韧性,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利于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带动国际经济循环,实现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强调的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经济单循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战略方向,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各环

节的堵点,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设现代流通体系,提高流通效率,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升级,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既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又能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市场机会。要深入参与国际循环,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积极塑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对外开放,扩大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使我国成为吸引全球优质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成为外商投资兴业的沃土,使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促进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繁荣发展。要练好内功,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着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关键是做好改革、开放、创新三件关键大事,凝聚社会共识,把短期、中期、长期发展目标衔接、协调、统一起来,增强战略一致性,顺利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总之,内外统筹、内外双修、内圣外王,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稳步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占据当今时代道义和真理的制高点提供实践的依据和事实的基础。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世界化的新阶段、新境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效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基础上指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旗帜。

作者简介:李庚香,河南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党组书记、研究员、法学博士。

(摘自《领导科学》2021·1月上)